

论朱开沟遗址出土的两类遗存

王乐文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可以分成两类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本文结合朱开沟遗址周邻地区其它遗址出土的同类遗存, 分别探讨这两种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分期、渊源、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及其有关问题。

关键词: 朱开沟甲类遗存; 朱开沟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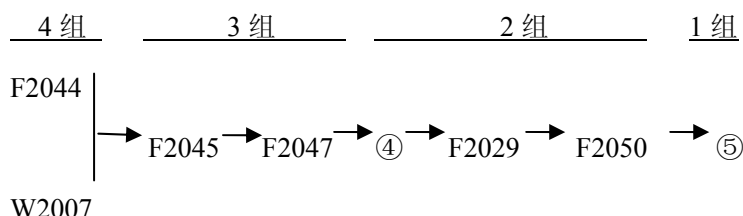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笔者在《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分析》^[1]一文中, 对朱开沟遗址所谓“朱开沟文化”遗存进行了重新梳理, 把其区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 朱开沟甲类遗存和朱开沟文化, 并认为“二者不仅文化面貌不同, 而且在起源、分布和存续时间等方面皆不相同”。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这两类遗存的分期、年代以及源流等问题, 鉴于上篇文章已经分析了它们各自的命名与分布情况, 这里不再赘述。

一、朱开沟甲类遗存

(一) 典型遗址分期

1. 朱开沟遗址^[2] 指上篇文章所分的甲组遗存。已发表的典型层位关系以 T227—T249 发掘区为例^[3], 可利用的层位关系可整理如下:



结合各地层和遗迹单位已发表的器物的形制, 可把以上单位分为 4 组: 第 1 组, 包括第 5 层; 第 2 组, 包括第 4 层、F2029 和 F2050; 第 3 组, 包括 F2045 和 F2047; 第 4 组包括 F2044 和 W2007。如此, 分别对其它各发掘区也进行分组。参照居住址分组, 结合器物形制, 对土坑墓也进行分组。最后可把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分为 4 组, 各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对应关系列成表一。

2. 大口遗址^[4] 1962 年调查时发现, 1973 年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掘面积共约 140 平方米, 共清理房址 2 座、灰坑 1 个、瓮棺葬 7 座和成人墓葬 3 座。出土完整陶器 20 余件, 石、骨器 100 余件。发掘者将该遗址的遗存区分为两类: 第⑤、⑥层为“大口一期文化”, 第③、④层为“大口二期文化”。从发表器物看, “大口二期文化”中的瓮棺葬和部分采集的遗物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相类。二者陶器形态比较一致, 年代应大致相近。其中 DKW6: 1 甗与朱开沟第 3 组的 W2011: 1 形制相同, 故以大口 DKW6 为代表的遗存的年代应相当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第 3 组, 个别器物可能早至第 2 组。

3. 石峁遗址^[5] 1976 年开始调查，征集到一批玉、石器和陶器。1981 年，西安半坡博物馆进行了试掘。发掘面积 84 平方米，发掘房址 2 座、灰坑 1 个、石棺葬 4 座和瓮棺葬 1 座。发掘者认为“石峁遗址的相对年代，约与陕西客省庄第二期文化同时”，石峁玉器和石棺葬的年代“晚于石峁龙山文化，而与大口二期文化同时”。其中，M2 和 W1 出土的器物及少数采集的器物，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同类器相近，应属同一类遗存。简报中没有提供相应的层位关系，根据器物形制，石峁遗址已发表的朱开沟甲类遗存可分为两组。第 1 组主要是 M2 和 W1 出土的器物，第 2 组仅有少数几件采集的器物，如采：4 三足瓮和采：9 双耳尊。第 1 组 M2 随葬的鬲和三足瓮均袋足较深，W1：2 折肩罐口颈较小，都是偏早特征，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第 1 组相似。第 2 组三足瓮袋足较浅，尊腹较深，大致相当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 3、4 组。 表一：

分组 发掘区等	4	3	2	1
T102-T110	H1014			
T201-T206		W2001	W2003、④	W2002、⑤
T207-T210				④、H2011、⑤
T211-T226	H2022、 H2034、H2035	W2006、W2009		
T227-T249	W2007、F2044	W2011、W2015 F2045、F2047	④、F2028、F2029、F2050	W2013、H2047、H2058、⑤
IV 区			④	
土坑墓	以 M3019、 M3039 和 M4012 为代表	以 M1042、M3018 和 M3026 为代表	以 M1010、M1051 和 M4021 为代表	以 M1060、M2020 和 M2026 为代表

4. 白敖包遗址^[6] 1986 年，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在白敖包遗址的西部清理了 1 座房址、11 个灰坑和 2 座墓葬（其一为瓮棺葬）。1989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发掘，发掘面积达 6000 平方米，清理墓葬 67 座、房址 2 座、灰坑 37 个，出土陶器 240 余件、装饰品 10 余件。但是，目前已发表的只是两次清理的墓葬材料。该遗址墓葬出土的器物同朱开沟遗址土坑墓甲组十分一致。白敖包遗址墓葬没有层位关系发表，参照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分组，据墓葬出土的器物形制分析，白敖包遗址墓葬大致可分为 4 组，分别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 4 组对应。第 1 组墓葬有 M22、M23、M31、M33、M51 和 M52；第 2 组有 M2、M11、M15、M16、M20、M21、M58 和 M64；第 3 组有 M14、M37、M41 和 M46；第 4 组有 M24、M25、M53、M59、M66 和 M67。不过，由于简报发表的资料比较零散，而且没有墓葬登记表，所以此分组可能会有所偏差。

5. 新华遗址^[7] 1996 和 1999 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见于发表的主要是 1999 年的发掘资料。此次共发掘灰坑 155 个、墓葬 72 座（其中有 4 座瓮棺葬）、房子 33 座、窑址 5 处和玉器坑 1 座。出土陶器的质地、纹饰和形制皆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相类。综合层位关系和器物形制，新华遗址已发表遗存可分为 3 组，第 1 组有 99SXH108；第 2 组以 99SXW3 和 99SXH50 为代表，还有 96SXH27；第 3 组以 99SXW4 为代表，还有 H83。此三组分别与朱开沟遗址 1、3、4 组对应。

6. 寨崩遗址^[8] 1986 年调查发现, 1991 年试掘, 1993 年正式发掘。发掘面积 700 余平方米, 发现遗迹有房子、窖穴和墓葬。发掘者将出土遗存分成三期, 其中的“第二期”遗存被发掘者称为“寨崩文化”。从发表的器物形制看, 在寨崩“第二期”遗存中, 以遗址第 2 层和 AH60、AH18 等单位为代表的遗存, 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相同或相近。从单耳鬲(AT3010②: 3)、盂(AT2011②: 2)和大口尊(AT4011②: 9)的形制特征来看, 年代大约相当于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的第 1 组。

(二) 典型器物的类型与演变

通过以上对各典型遗址中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年代组划分, 可将这类遗存总体上划分为前后相继的四组。根据它们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 可把上述诸遗址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各年代小组归纳为表二:

第四组	朱开沟 4 组		白敖包 4 组	新华 3 组		石崩 2 组
第三组	朱开沟 3 组	大口二期	白敖包 3 组	新华 2 组		
第二组	朱开沟 2 组		白敖包 2 组			
第一组	朱开沟 1 组		白敖包 1 组	新华 1 组	寨崩	石崩 1 组

在这四组遗存中有些典型器物有着明显的演变规律可寻。下面对此四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出土的陶器予以分类介绍。

盪手鬲 是朱开沟甲类遗存最具代表性的器类之一, 目前仅见于居住址中。多为夹砂灰陶, 袋足多模制, 套接颈部, 口部经慢轮修整。直口或侈口, 腹最大径大多居中, 偏早阶段有少数为腹最大径靠上。大多颈部磨光, 肩腹部饰绳纹。一般在一侧裆部及与其对应的足部饰双盪。各遗址俱有较多发现, 但完整器很少, 不细分型。其中弧腹者可分三式, 参见图一: 1—3。演变趋势: 袋足容积变小, 下端逐渐出现实足根; 盪手由发达渐消失; 从开始的口部磨光到通体施细绳纹。

单耳鬲 是墓葬中出土最多的器类之一, 数量众多, 形态多样。夹砂灰陶或泥质灰陶。一般侈口, 高领较直或略弧, 颈部素面磨光或饰绳纹, 腹足多饰方格纹, 也有饰绳纹者。根据腹足形态, 可分为两型:

A 型 近颈部上鼓出肩, 至足部斜收。可分四式。参见图一: 4—7。演变趋势: 腹身部分(除去实足根)由瘦高到宽矮, 肩(腹)部越来越鼓; 袋足容积渐小, 实足根从无到有; 单耳逐渐升高, 由与器口平到高出器口。

B 型 弧腹, 最大径居中。可分四式。参见图一: 8—11。演变趋势: 同 A 型。

盂 在居住址和墓葬中都有较多发现, 但在居住址中多为残片。夹砂或泥质灰陶。敛口, 折肩, 斜直腹或斜弧腹, 圜底, 腹部一袋足的上方有一斜向管状流, 肩部对称饰长方形扁平双盪。肩部以上多素面, 腹、足部多饰绳纹。可分四式, 参见图一: 12—15。演变趋势: 足部演变趋势同鬲, 器身也是由瘦高渐宽矮。流与器口夹角渐小, 流口上扬, 安流的部位也逐渐上移。

敛口斜腹甗 皆发现于居住址中或作为瓮棺葬具, 是朱开沟甲类遗存中的典型器物之一。数量较多, 但发现的完整器很少, 多是甗盆口或甗腰以下的袋足部分。均为夹砂灰陶。敛口内折, 腹部斜直, 腰部施一周附加堆纹, 有的腹置双盪。甗的盆和鬲部皆可分为两式, 参见图一: 16—18。演变趋势: 甗的鬲部演变规律同鬲。甗盆口部由磨光到遍施绳纹, 腹部渐内收, 腰渐细, 腰径与口径之比渐小。

三足瓮 数量较多，绝大多数为泥质灰陶。敛口，深腹，圜底，下接三乳状袋足。大多用于瓮棺葬具，土坑墓中不见。据腹部形态，可分两型：

A 型 深弧腹，腹最大径靠下，腹、底之间无明显折棱。可分为三式，参见图一：19—21。演变趋势：袋足由深变浅，内折沿逐渐消失。腹足间的夹角越来越大。

B 型 斜腹，上腹较直，腹最大径在近底处，腹、底之间折棱明显。可分三式，参见图一：22—24。演变趋势：同 A 型。

罍 发现数量不多，但颇具代表性。均为夹砂灰陶。据口腹形态差异，可分三型，均未分式。

A 型 敛口内折，形制同盂，但无流。一般口部磨光，腹部施交叉附加堆纹和双螭（参见图二：11）。

B 型 直口微敛，厚方唇，有的唇面外折，浅弧腹饰粗篮纹，有的还带有鸡冠状双螭。

C 型 敞口卷沿，深直腹，带双螭。目前仅在新华遗址有所发现（参见图三：15）。

单耳罐 是墓葬中出土最多的器类之一。泥质或夹砂灰陶，多手制。一般口部磨光，腹饰篮纹、方格纹或绳纹，有的素面。根据颈部的高矮，主要可分两型：

A 型 侈口，高领，鼓腹。依腹部最大径位置，可分为两亚型：

Aa 型 腹最大径略偏上。可分三式，参见图一：25—27。演变趋势：整体由瘦高到胖矮，腹部越来越宽扁。

Ab 型 腹最大径居中。可分四式，参见图一：28—31。演变趋势：基本同于 Aa 型。

B 型 侈口，矮领，鼓腹。依腹部最大径位置，可分为两个亚型：

Ba 型 腹最大径略偏上。可分三式，参见图一：32—34。演变趋势：同于 A 型。

Bb 型 腹最大径居中。可分三式，参见图一：35—37。演变趋势：大致同于 A 型。底部起台越来越明显。

双耳罐 也是墓葬中出土较多的器类。大多为泥质灰陶，少量泥质黑皮陶。多轮制、素面，少数饰篮纹。类型多样，据耳部形态，主要分为三型：

A 型 双耳一般为圆弧拱形，接于口腹之间，上部与口平或高于器口。多为泥质灰陶。据整体形制，可分为两亚型：

Aa 型 高瘦体。可分三式，参见图一：38—40。演变趋势：整体由瘦高到胖矮。腹由深而浅，下腹部越来越向内斜收。耳趋于近圆形。

Ab 型 矮胖体。可分四式，参见图一：41—44。演变趋势：同于 Aa 型。

B 型 双耳形制大致同于 A 型，但略小。采用嵌入法与罐体连接，耳上部低于器口。从目前发表资料看，仅见于朱开沟墓地，且数量较少。多为泥质灰陶，素面磨光。未分式，参见图三：4。

C 型 双耳瘦直较长，接于口腹之间，上部与口平齐或略低。从目前发表资料看，仅见于朱开沟墓地，数量不多。皆为泥质黑皮陶，素面磨光。未分式，参见图三：13、14。

折肩罐 大多为泥质灰陶，少数为夹砂灰陶，手制或轮制。高领折肩，颈部磨光或饰弦纹、压印纹或篮纹，肩、腹部素面或饰篮纹，有的带双耳。在居住址和墓葬中均有发现，一

般形体较大。根据肩部形态，可划分两型：

A 型 短肩，折肩部靠上。据领、腹部形态，又可分两亚型：

Aa 型 领口外翻，呈大喇叭形。肩部上抬。可分三式，参见图一：45—48。演变趋势：口径由小渐大，从口径小于肩径到二者相若。

Ab 型 领部较 Aa 型矮小，肩部较 Aa 型略下斜。可分为三式，参见图一：49—51。演变趋势：口径越来越大，由与底径相若到大于底径。

B 型 长肩，折肩部靠下，近似折腹。可分三式，参见图一：52—54。演变趋势：同于 Aa 型。

豆 在墓葬中发现较多，居住址中也有发现。大多为泥质灰陶，个别为泥质红陶和黑皮陶，也有少数夹砂陶。豆盘多敞口，有的口沿外折，腹部或浅或深，或斜腹或弧腹。豆柄有些素面，有些饰圆形或三角形镂孔。根据豆盘形态，分为两型：

A 型 盘形豆。豆盘底径较大而平，似盘形。据豆柄形态差异，可分两亚型：

Aa 型 豆柄细高。可分三式，参见图一：55—57。演变趋势：盘腹渐深，豆柄渐矮。

Ab 型 豆柄粗矮。亦可分三式，参见图一：58—60。演变趋势：基本同于 Aa 型。豆盘的底径渐小。

B 型 碗形豆。豆盘底径较小，有的内底为圆底，底壁较厚，似碗形。可分三式，参见图一：61—63。演变趋势：同于 Aa 型。

壶 从目前所发表的资料看，在朱开沟墓地中有较少发现。均泥质灰陶，手制。多素面磨光。以其整体形态，可分两型：

A 型 高颈，浅腹，整体瘦高。根据腹部形态，可分两个亚型：

Aa 型 缓折肩或鼓肩，高颈微敛，口沿稍外折。可分四式，参见图一：64—67。演变趋势：整体由高渐矮，由瘦到胖。颈腹转折越来越不明显。从缓折肩到圆鼓肩。

Ab 型 腹中部缓折，口外敞。可分三式，参见图一：68—70。演变趋势：基本同 Aa 型。折腹渐缓，器腹越来越宽扁。

B 型 矮颈，腹圆鼓，整体肥胖。可分三式，参见图一：71—73。演变趋势：整体由高渐矮，由瘦到胖。腹部愈圆鼓，并向底部内收起台。

大口尊 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发现。泥质灰陶，手制。均敞口，有的腹部饰篮纹。据腹部形态，可分三型：

A 型 深腹斜直，有的腹带双螯。可分三式，参见图一：74—76。演变趋势：整体由矮胖到瘦高，腹部渐深。

B 型 深弧腹，有的腹带双耳。可分四式，参见图一：77—80。演变趋势：同于 A 型。

C 型 口腹之间有明显折棱。可分三式，参见图一：81—83。演变趋势：大致同于 A 型。口腹之间的折棱越来越小。

通过对上述器物的分类和排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器物不仅自身有着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有些器类的演变存在一定的共性：

1. 除螯手鬲、折肩罐和大口尊外，其它器类的腹身大都由瘦高渐矮胖；

2. 部分器的耳有逐渐上提，高出器口的趋势；
3. 袋足器均是袋足容积渐小，实足根从无到有，逐渐发达；
4. 大多壶、罐类平底器在较晚阶段有底部起台的趋势。

为了更清楚地观察朱开沟甲类遗存发展的阶段性，我们将上述典型器物的分类排序结果纳入根据遗址分期及其对应关系所得出的四个年代组中，并制成表三：

类型 组段	盞 手 鬲	花 边 鬲	肥 足 鬲	单耳鬲		盃	甗		甗			三足瓮		花 边 罐	单耳罐	
				A	B		盆	足	A	B	C	A	B		A	
															a	b
4	III	√		IV	IV	IV	III					III	III	√	III	IV
3	II	√	√	III	III	III	II	II			√	II	II			III
2		√	√	II	II	II				√		I		√	II	II
1	I	√	√	I	I	I	I	I	√	√			I	√	I	I

注：为了较全面地表现各年代组陶器群的整体面貌，有些未分型式的器物也列入表中，并用“√”表示。下同。

单耳罐		双耳罐				双 大 耳 罐	折肩罐			豆			壶			大口尊			圈 足 盘	单 耳 碗
B		A		B	C		A		B	A		B	A	B	C					
a	b	a	b				a	b		a	b									
III	III	III	IV				III	III	III	III	III	IV	III	III	III	IV	III		√	
II	II		III			√		II			II		III	II	II		III	II		
I	I	II	II	√	√	√	II		II	II	I	II	II	I	I	II	II		√	√
		I	I		√		I	I	I	I		I	I			I	I	I	√	

（三）分期与年代

1. 分期

从表三所示情况看，前文归纳出的四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已分型陶器的多数型别在形制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化，表明这四组地层和遗迹单位发展的阶段性十分明显。据此，可将前述四组遗存单位视为朱开沟甲类遗存从早到晚、顺序发展的四个阶段的代表。

第一段：以第1组遗存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类有I式盞手鬲、AI和BI式单耳鬲、I式盃、I式甗盆和I式甗鬲、BI式三足瓮、AaI和AbI式单耳罐、AaI和AbI式双耳罐、AaI式、AbI式和BI式折肩罐、AaI式和BI豆、AaI式壶、AI式、BI和CI式大口尊。共出的还有A型和B型甗、C型双耳罐、

及未分型式的花边鬲、厚方唇肥袋足鬲、夹砂罐、花边罐、卷沿折腹宽平底单耳罐、双耳筒状罐、斜直腹的大平底盆、折沿深弧腹盆、带三足的双耳杯、圈足盘和斜直深腹碗等。此时，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均占一定比例，印痕一般较粗深。器口大多抹光，花边器的花边状附加堆纹比较粗大，印窝较大而深。大部分器类都较瘦高，袋足器足部容积较大，

无实足根或实足根不明显。甗腰较粗，盂的流口与器口平，流、口夹角较大。豆柄细高，豆盘斜直腹较浅。折肩罐口均较小。大口尊敞口较大似盆形。

第二段，以第2组遗存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物有AII式和BII式单耳鬲、II式盂、AI式三足瓮、AaII式、AbII式、BaI式和BbI式单耳罐、AaII式和AbII式双耳罐、AaII式和BII式折肩罐、AaII式、AbI式和BII式豆、AaII式、AbI式和BI式壶、AII式和BII式大口尊等。在共存器物中，前段已有的器类未见折沿深弧腹盆、B型罍，其它器类都仍有发现。另外，此段器类更为丰富，新出现了B型双耳罐、双大耳罐、单耳碗、浅斜弧腹盆、直腹三足瓮、伞形器盖、平折沿深折腹盆、折腹盆形簋、花边口单耳杯、带三足的左执宽流器、带盖的折沿筒腹小罐和深盘矮柄碗形豆等。此时，陶器纹饰仍以绳纹为主，但较前期变细。方格纹比例有所增加。花边器的花边状附加堆纹较前期细小。单耳鬲、盂、单耳罐和双耳罐等器整体近方形，部分器的耳开始上高出器口。壶、罐类器物的底部普遍出现起台的现象。单耳鬲袋足由深变浅，盂流开始高出口部，流、口夹角变小。豆柄变粗，豆盘变深，B型大口尊腹部转折消失。

第三段，以第3组遗存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物有II式盪手鬲、AIII式和BIII式单耳鬲、III式盂、II式甗盆和II式甗鬲、AII式和BII式三足瓮、AbIII式、BaII式和BbII式单耳罐、AbIII式双耳罐、AbII折肩罐、AbII式豆、AaIII式、AbII式和BII式壶、BIII式和CII式大口尊等。在共存器中，前段的B型和C型双耳罐、花边罐、平折沿深折腹盆、折腹盆形簋、带盖的折沿筒腹小罐、花边口单耳杯、带三足的左执宽流器、圈足盘和单耳碗等器类均未见标本。新出现C型罍、大口瓮等器类。在朱开沟墓地还发现一件小罐，此罐腹部缓折，向底部斜收起台（参见图四：3）。一件鬻形器，此器“系将单耳鬲与器把相对应的一侧的颈部加高，再圈成管状注而制成”，去流则与单耳鬲无异（参见图五：3）。这两种器物前期均未见。此段，陶器纹饰较细，印痕较浅，器口抹光者减少。大部分袋足器都出现了较明显的实足根，平底器底部起台更明显。单耳鬲袋足容积继续变小。甗盆腹部斜收程度加大，甗腰较细。盂流翘的更高，流、口夹角更小。壶的腹部由折变圆。大口尊腹部略内收，腹径变小。

第四段，以第4组遗存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物有III式盪手鬲、AIV式和BIV式单耳鬲、IV式盂、III式甗盆、AIII式和BIII式三足瓮、AaIII式、AbIV式、BaIII式和BbIII式单耳罐、AaIII式和AbIV式双耳罐、AaIII式、AbIII式和BIII式折肩罐、AaIII式、AbIII式和BIII式豆、AaIV式、AbIII式和BIII式壶、AIII式、BIV式和CIII式大口尊等。共存器物有花边鬲、深盘矮柄碗形豆、卷沿斜弧腹盆、花边罐和单耳碗等。与前段相比，本段陶器纹饰多为细绳纹，袋足器的实足根更高更发达。盪手鬲盪手消失，颈部饰绳纹，不再磨光。盂流进一步上扬，流、口夹角进一步变小。壶腹变扁，大口尊腹部更深。开始出现纯铜的指环和铜钏。

纵观以上各段的总体特征，可将上述四段归纳为两个较大的时期，以凸显其阶段性差异。第1、2段可统为早期，此期器类逐渐增多，以至极大丰富。器形走向成熟，多数器类的由近长方到近方体的演变过程。第3、4段都属于晚期，本期袋足器实足根较前期明显，器形多近扁方。器类较前期有所减少，晚段出现了纯铜制品。

2. 年代

早期2段的朱开沟M1010：1单耳鬲与河南孟津小潘沟T5F7：35相同，朱开沟M6008：1鬻形器同小潘沟T6H47：20“鬻”的鬲形相似，且与小潘沟T11H60：2“盂”注的制作方式相同，另外，本段出现的单耳碗和单耳杯在小潘沟均能找到相似器，小潘沟T11H65：7单耳罐也与朱开沟M1042：1相同。因此，朱开沟甲类遗存早期2段与小潘沟遗址出土遗存的年代应该大体相当。而小潘沟遗址出土遗存，约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的偏晚阶段。另外，见于早期2段或稍晚的折肩罐、折腹圈足罐、折腹盆、折腹盆形簋和单耳碗等器物，在晋南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晚期都有十分相似的同类器形^[9]。综合分析陶寺遗址所测得的 17 个碳十四数据（皆经树轮校正）^[10]，陶寺遗址晚期的年代应为公元前 2100 年左右。晚期 3 段的双大耳罐朱开沟 M1048: 2 弧腹瘦长体的特征与皇娘娘台 M89: 1 相同，皇娘娘台 M89 在张忠培先生的《齐家文化研究》中与大何庄 F7 同属“三期一段”，而据大何庄 F7 的碳十四年代数据，齐家文化三期已进入夏纪年^[11]。此外，晚期 3 段出现的 C 型罍深腹、侈口、三足外撇，与客省庄文化晚期的罍相似，年代可估计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900 年前后^[12]。朱开沟甲类遗存在各遗址中都没有可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13]，通过以上比较，朱开沟甲类遗存早期 2 段的年代应当大致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晚期 3 段的年代进入夏纪年的早期。那么，晚期 4 段，也即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的最晚阶段，应较公元前 2000—公元前 1900 年这一年代范围更晚。另外，与晚期 4 段发现的卷沿斜弧腹盆相同的器形在二里头遗址二期以后方才出现，而且盞手鬲双盞消失在晋中地区也是在夏代早期以后开始的。因此，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年代下限当在夏纪年的早期以后。而其年代上限，按照上述讨论，当在龙山时代晚期的偏晚阶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 2200 年左右。

（四）文化因素分析及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1. 文化因素分析

朱开沟甲类遗存器类众多，器形富于变化，大多数器物的发展脉络清晰。但其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先行考古学文化和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影响。这既有对其先行文化的继承与变革，又有对同时代的周邻考古学文化的吸收与借鉴。因此，我们在这些器物类型划分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及周邻已知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剖析，分析各文化因素的来源，揭示其传布过程，探讨朱开沟甲类遗存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进而考察其中暗含的古代人群的迁徙与流动。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把朱开沟甲类遗存的主要器类划分为 A、B、C 三群。

A 群 主要包括盞手鬲、单耳鬲、敛口斜腹甗、盃、A 型和 B 型罍、A 型双耳罐、折肩罐、A 型壶、豆、大口尊、斜直腹盆、伞形器盖、A 型单耳罐和三足瓮等。主要是承袭当地的文化传统，并有所改变（参见图二：1—16）。在朱开沟甲类遗存之前，存在于当地的是龙山时期的永兴店文化^[14]。由于“永兴店一类遗存与分布于山西晋中、忻定和河北张家口地区以矮领胖袋足双盞鬲为代表的遗存，在文化面貌上有着较多的一致性……从广义上讲，二者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范畴”^[15]。所以，我们在分析 A 群器物的来源时，将永兴店文化和上述地区视为一个大的文化区。朱开沟甲类遗存 A 群器物皆源于此。盞手鬲、盃和罍等器物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忻定和冀西北等地区皆有其早期形态，敛口斜腹甗和折肩罐在永兴店文化和忻定、晋中地区有其早期形态。据田广金等先生研究，这些器类皆源于本地^[16]，也即永兴店文化。它们的发展轨迹都比较明晰。鉴于田广金等先生已论证甚详，这里不再赘述。双耳罐在永兴店文化和晋中地区龙山时期遗存中都有发现，它的来源应与此二者有关，其腹部较永兴店文化同类器深，整体较高，可能是受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同类器的影响所致。尤其是 Aa 型双耳罐体形瘦高，下腹斜收，当是受到了齐家文化的较大影响。但朱开沟甲类遗存的 A 型双耳罐与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同类器差别甚大。前者多折腹，耳较大，上接至唇口处，与口、颈和上腹部相连呈圆弧形，上部与器口平或高于器口，而后者则都为圆腹，耳较小，接在口沿下方，与颈部连线呈三角形或椭圆形。朱开沟甲类遗存多数器与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同类器存在上述差别。对于单耳鬲，有源于当地和来自客省庄文化两种观点。我们倾向于前者，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单耳鬲在制作与形态上同客省庄文化单耳鬲有较大差异。在组装方式上，前者多是“三足对称组装”，后者多为“前后腿的组装方式”^[17]。在形态上，除了前述的器耳不同以外，前者整体较矮胖，袋足较肥，为方体鬲；后者总体瘦高，袋足瘦长，为长方体鬲。前者多为高直立领，后者多是矮

领卷沿。其二、二者产生机制不同。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单耳鬲自有一套产生和发展的序列。据王立新先生研究,客省庄文化的单耳鬲多“来源于前后腿的釜形鬲和釜灶、夹砂罐等炊器形式的结合……最早产生于泾水流域和渭水中游地区”,而晋中—岱海地区的单耳鬲应“脱胎于三足等边分立的釜形鬲”。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单耳鬲“三足对称组装”方式与源于本地地区的釜手鬲相同,而且无论是釜手鬲还是单耳鬲,在本地区都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发展序列。重要的是,即使是客省庄文化最晚期的单耳鬲,其领部仍以外卷为多,直领较少,且体态瘦长,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同类器差别甚大。《晋中考古》杏花村遗址第四期遗存^[18],报道有较多的宽弧裆鬲,按照张先生的研究认识^[19],年代当早于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尖角裆鬲,与其共出的有单耳罐、折肩罐、胖体单耳(鬲式)鬲和细颈壶等。其中,单耳罐同朱开沟甲类遗存的A型单耳罐相似,应是A型单耳罐的源头。其它器物分别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的Ab型折肩罐、单耳鬲和A型壶相近,应当跟它们的来源关系密切。豆在朱开沟甲类遗存的早期皆为浅盘高柄豆,在早于它的遗存中只有永兴店文化的同类器具备这一特征,晋中和忻定等地区虽然也有浅盘细柄豆,但豆柄都较矮。大口尊、伞形器盖和斜直腹盆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忻定等地区皆有发现,它们的来源当与这些地区有关。大口尊在晋中和忻定等地区的数量都不多,但却是永兴店文化的典型器类,发现较多,因此它应源于永兴店文化。三足瓮在内蒙古中南部、晋陕间的黄河两岸、晋中南及关中地区均有发现,但早期主要分布于晋中、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地区,据研究,它最早起源于晋中地区,并迅速传播到与之毗邻的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地区^[20]。

综上所述,朱开沟甲类遗存A群器物皆继承于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忻定和陕北等地的龙山时代早中期遗存,而其最主要来源当是本地的永兴店文化。少数器类则可能源自山西的晋中和忻定以及陕北等地区。

B群 主要包括双大耳罐、B型和C型双耳罐、深盘矮柄碗形豆、C型鬲和花边罐等,这些器类在朱开沟甲类遗存中数量较少,主要来自关中和河湟地区(参见图三:1—5、11—16)。双大耳罐是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朱开沟遗址发表的三件双大耳罐,在齐家文化都能找到形制相同者,应是受齐家文化影响的结果。C型鬲是客省庄文化的常见器物形态,当是来源于此。B型和C型双耳罐腹、耳形制和整体造型分别与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应是受它们影响的结果。但是C型双耳罐耳上端接于口部,与口略平,却是本地的传统。深盘矮柄碗形豆与朱开沟甲类遗存中源于本地的B型豆明显不同,它一般圜底,柄较矮并呈喇叭形。与齐家文化常见的豆形制相近,应来自于齐家文化。朱开沟M1017:3豆柄镂有三角形孔,说明此类豆在传入的过程中,与本地豆的传统发生了融合。花边罐在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都有发现,但是此类器物多见于关中地区,故应是从客省庄文化传过来的。发端于内蒙古中南部的花边鬲,口部所饰花边及装饰风格与花边罐相同,当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另外,朱开沟墓地M1005:3单耳罐,卷沿束颈,鼓腹,颈口部磨光的特征与客省庄文化的单耳鬲相似,可能是从其变化而来的。

C群 主要有厚方唇肥足鬲、折腹盆形簋、折腹盆、折腹圈足罐、折沿弧腹盆、B型壶、B型单耳罐、三足杯、单耳碗、圈足盘和左执三足鬻形器等,是来自晋南、豫西等地的文化因素(参见图四:1—15)。厚方唇肥足鬲,直口或侈口,往往还附有侧装的釜手,在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这种器物在本地前所未见,在釜手鬲起源和流行的晋中地区也没有发现,它常见于晋南地区的陶寺类型遗址。襄汾的陶寺遗址^[21]、中梁村遗址^[22]和洪洞的侯村遗址^[23]皆有发现,所以这种器物应来自于晋南地区。折腹盆形簋和折腹圈足罐是陶寺类型的典型器类,在朱开沟甲类遗存中发现较少,也当源于晋南。此外,朱开沟墓地M4014发现的一件折腹盆,与上述簋的盆部形制相同,应与簋同源。B型壶直口圆腹收底的特征与王湾三期文化常见的直口圆腹壶相同。B型单耳罐小卷沿及器耳形态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其收底起台及饰方格纹的特点更是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特征。三足杯,一

般单耳，朱开沟遗址也有双耳的，应是受双耳筒状罐的影响。这种器类在晋中杏花村、晋南陶寺和豫西都有发现。单耳碗，有斜直腹和折腹两种，前者在晋中、晋南和豫西皆有发现，后者仅在晋南和豫西出现。圈足盘在晋南和豫西等地皆有发现，而左执三足鬲形器则只发现于豫西地区。上述各种器类在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和晋南等地，皆发现较少，且不具代表性。但它们却是豫西地区的常见器类。因此，它们均应来自豫西地区。朱开沟甲类遗存的这些器类当是自豫西地区经晋南、晋中沿汾河北传而至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开沟甲类遗存 A 群器物，数量众多，形态稳定，序列清楚，是遗址和墓葬器物组合中最常见的器类，共同构成了朱开沟甲类遗存的主体因素，成为其代表性器物。它们大都直接源于早于它的龙山时代的永兴店文化。因此，朱开沟甲类遗存是在永兴店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并且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周边地区其它考古学文化不同程度的影响。

2. 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同文化分期相结合，动态地考察各时期朱开沟甲类遗存与周边地区其它各考古学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探讨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形成发展历程以及周邻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段，先行的永兴店文化，受到了来自西部和南部的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以及晋南、晋中等地区龙山遗存的强烈冲击，文化面貌发生变化，形成了朱开沟甲类遗存。它主要体现在：（1）在器物形制上，双耳罐等器类腹部拉长变深，一改原来宽扁的作风，但比之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同类器仍较矮胖；（2）单耳鬲、双耳罐和单耳罐等带耳器突然增多；（3）、晋南陶寺类型的厚方唇肥足鬲和关中地区的花边罐传入，并受花边罐的启示新产生了花边鬲；（4）器物种类大大增加，原有器类发生较大变化。它主要表现在三足器的比例大大增加，鬲类器裆距变窄，形态趋于多样。先前流行的单耳罍完全消失，为绳纹和方格纹的单耳鬲所替代。甗和盂的形态稳定，新的无耳釜手罍诞生。晋中地区的三足器新品种——三足瓮开始出现。王湾三期文化常见的圈足盘等器类也传入本地。由于本地区与周边其它地区的交流日趋频繁，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以致文化面貌同陕北、晋北和冀北越来越呈现出较大的一致性。这一切均表明，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开始步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充满了交流碰撞、迁徙变革的时代。此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交流基本上是流入不流出的单向式，主要是被动地接受关中、河湟地区的冲击，吸收来自豫西—晋南—晋中一线的文化因素。

从第一段开始的交流态势继续发展。但从汾河流域自南而北流入的文化因素持续增强，占据了上风。源自晋南的折腹盆形簋、圈足罐，豫西的 B 型壶、B 型单耳罐、三足杯、单耳碗和左执三足鬲形器等器物以及方格纹饰都在此期开始出现或流行。而关中和河湟地区的影响也有所增强，这反映在双大耳罐和矮柄深腹碗形豆的传入、墓葬中多种形式合葬墓的流行和白敖包遗址土洞墓的出现上。另外，此时的交流开始呈现双向的态势，豫西小潘沟遗址出土的单耳鬲、单耳鬲和单耳罐等都能在朱开沟甲类遗存中找到完全相似者（参见图五：6—8）。在河南临汝煤山遗址^[24]也发现了类似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单耳鬲残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最新发表了一件单耳鬲 99IIIH22：9（参见图五：5），时代在陶寺类型的晚期。其侈口，高领，鼓腹以及口部磨光，腹施方格纹等特征与朱开沟 M1036：1 非常相似。尤其是其安耳方式也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带耳器完全相同。但是该器形体瘦高、袋足根部瘦尖的特征仍然还保留着当地的文化特色。小潘沟等遗址的这些器物都应是在同朱开沟甲类遗存的交流中反馈而来的。这说明此时晋南豫西地区与朱开沟甲类遗存交流非常频繁，关系十分密切。这反映出朱开沟甲类遗存经过长期的发展，势力增强，开始向周邻的地区施加影响。

第三段，来自上述各地区的文化因素开始衰退。源于客省庄文化的 C 型双耳罐消失。自汾河流域经晋中北上的力量较前期更是大大衰弱，除了从第二段就已扎根于朱开沟甲类遗

存的 B 型单耳罐和 B 型壶继续发展，还见有厚方唇肥足鬲外，其它文化因素基本不见。齐家文化的影响仍然反映在双大耳罐上。

第四段，源于周边龙山晚期遗存的影响趋于消失。但齐家文化的双大耳罐和矮柄深腹碗形豆仍有发现。折肩罐敞口越来越大，呈大喇叭形，也当是受到了齐家文化同类器的影响。另外，在朱开沟居住址中发现了类似二里头文化的平折沿斜弧腹盆。这说明夏文化也开始对此地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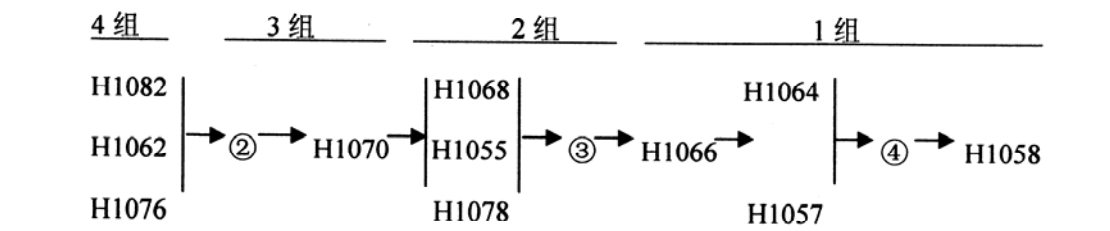
（五）流向

在朱开沟甲类遗存结束之后，存在于其故地的是朱开沟文化。从上篇文章的分析可以看出，该类遗存与朱开沟甲类遗存面貌特征截然不同。但是，朱开沟文化不但保留了朱开沟甲类遗存的部分因素，如花边鬲和三足瓮等，而且有些因素（如花边鬲）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朱开沟文化消失后，花边鬲仍然广泛流传于我国北方长城地带和晋陕黄河两岸，影响深远。朱开沟甲类遗存的文化传统更是深入了人们的身心，直至西周时期，天马一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25]、张家坡墓地^[26]和客省庄遗址^[27]中还发现有与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典型器——双耳罐和大口尊非常相似的器物（参见图六：5—10），而且在晋侯墓地中有些还是青铜制品。

三、朱开沟文化

（一）典型遗址分期

1. 朱开沟遗址 指上篇文章所分的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可利用的层位关系很多，这里仅以 T124—T131 发掘区为例，参考报告第 11 页“图八 T126—T128 北壁剖面图”，将该区可利用的地层关系整理为：



结合各地层和遗迹单位已发表的器物形制，可把以上单位分为 4 组：第 1 组包括 H1058、第 4 层、H1064、H1057 和 H1066；第 2 组包括第 3 层、H1068、H1055 和 H1078；第 3 组包括第 2 层和 H1070；第 4 组包括 H1082、H1062 和 H1076。如此，再分别对其它各发掘区进行分组。参照居住址分组，结合器物组合和形制，对土坑墓和部分清理的灰坑及采集品也进行分组。最后可把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分为四组，各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对应关系列成表四：

发掘区等 \ 分组	4	3	2	1
T102-T110			H1013	
T117-T123				H1031、H1040、H1047 H1041、③、④
T124-T131	H1062、H1076、 H1082	②、H1070	H1055、H1056	H1066、H1057、H1064 F1020、④、H1058

			H1068、H1078、③	
T201-T206		②	W2004	③、W2005
T211-T226	H2023、H2024			H2030、H2038
T227-T249		F2037、H2056、W2008	③	F2026、F2035、W2012、W2014
IV 区	H4005、H4006、 W4003	②、H4001、H4002 W4001		③、W4002
V 区	F5001、H5028、 H5030	H5001、H5008、 H5010、H5023、H5029	H5011、H5004	
清理灰坑及采集品	QH47	QH40、QH79、C:152	QH78、QH81、QH82、 QH98、QH102、QH111	QH37、QH48、QH56 QH76、QH91
墓葬	M1070、 M2006、M4020	M1019、M1064、 M1084、M5020		M1027

2. 寨子塔遗址^[28] 主要包括 1987—1988 年发掘资料的“第四阶段”遗存，还有 1998 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遗址北坡清理的瓮棺葬 1 座和灰坑 1 个。见于发表的层位关系无可利用的。参考朱开沟遗址分组，根据器物形态差异将这批资料分成三组：第 1 组以 W1 及北坡清理的 H1 和 W1 为代表，还包括 H60、H4、H116 和 QH11，此组的北坡 H1：1 鬲与朱开沟 W2004：2 相近，QH11：1 盆与朱开沟 H5004：9 相似。因此，该组年代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的第 2 组；第 2 组典型单位有 H3、W2、QM1、QH9 和 QH4 等，本组 W2：1 鬲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3 组的 QH79：4 相同，时代应与之相当；第 3 组有遗址第 1 层、H22、H108、H109 和 H115 等单位，该组 H109：1 和 H115：1 鬲裆比较低，袋足容积较小，外撇较甚。H108：1 三足瓮袋足较浅。这些均为偏晚阶段的特征。而且 H22：1 鬲的上半部形制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4 组的 M4020：1 相似，所以，该组应晚于第 2 组，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4 组相当。

3. 官地遗址^[29] 1991 年发掘，揭露总面积达 1500 平方米。清理房址 18 座、灰坑 61 个、陶窑 2 座、围沟 3 段、灰沟 1 条。简报将出土遗存划分成五期，其中第五期与朱开沟文化相近。遗存时间跨度不大，可归为一组。从 F3、F4 出土的鬲和三足瓮袋足肥而深、带钮罐形体瘦长的特征看，时代应早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2 组的同类器，大致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的第 1 组。此外，该遗址器物口、颈部还流行戳印纹。

4. 南壕遗址^[30] 该遗址的“夏阶段遗存”与朱开沟文化遗存相似。见于发表的层位关系，没有可利用的。依据器物的形制演变可将其分成三组：第 1 组以 IF26、IF23 和 IH44 为代表，此组 IF23：1 鬲与官地 F4：1 相似，IF26：1 甗的鬲形与朱开沟 M1027：1 相近。故此组大致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的第 1 组；第 2 组以 IH48、IF13、IH49 为代表，本组 IF13：4 鬲及 IF13：2 和 IH48：1 甗鬲形制分别与寨子塔北坡 H1：1 和朱开沟 H5004：10 近似，所以此组年代应大致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2 组；第 3 组以 IF6 和 IH57 为代表，该组 IH57：4 方杯同于朱开沟 QH47：1，IF6：1 矮领罐形似朱开沟 H5030：3，IF6：2 盆同于寨子塔 H109：3，因此该组年代应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4 组相当。

5. 高家坪遗址^[31] 1990 年发掘，揭露面积 500 平方米。发现房址 4 座、灰坑 24 个。该遗址出土遗存都属于朱开沟文化。简报以三组遗存单位的层位关系，将其分为早、晚两期。由于见于发表的器物多为残片，我们无法再具体分析，所以基本保持简报的分期。早期的

F4: 1 甗的足部形制与朱开沟 QH79: 4 鬲相近, F4: 4 三足瓮与朱开沟 F2037: 2 形似, 故应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3 组, 而晚期则相应地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4 组相当。但简报归入晚期的 H17: 1 带钮罐形制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2 组的 H1055: 6 近似, 而且形体更显瘦高, 不应晚于 H1055: 6 带钮罐。故 H17 应从晚期组中抽出, 另为一组, 时代约当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2 组。这样, 高家坪遗址遗存就可以分成三组: H17 组可为第 1 组, 简报早期可为第 2 组, 简报晚期 (H17 除外) 可为第 3 组。

6. 庄窝坪遗址^[32] 1989 年调查时发现, 1990 年发掘, 揭露面积 425 平方米。清理房址 3 座、灰坑 24 个。简报把出土遗存分成四期, 其第四期属于朱开沟文化遗存, 仅有灰坑 5 个。未有完整器, 多为口沿, 以 H7 和 H16 为代表, 大致可划为一组。H16: 2 鬲足形态与朱开沟 QH79: 4 相似, H7: 1 鼓肩罐和 H7: 2 盆分别与朱开沟 QH79: 9 和 QH79: 3 近似, 所以其年代应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的第 3 组。

7. 白泥窑子遗址^[33] 遗址面积 70000 余平方米。1982 至 1989 年, 先后作过数次发掘, 其中在 A、D 点发现了朱开沟文化遗存。在 A 点发现房址 1 座、灰坑 5 个, 在 D 点清理灰坑 3 个。两地点出土遗物皆很少, 据器物形态分析, A 点的 H4: 1、2 鬲低裆、袋足外撇、略有实足尖、容积较小的特征与寨子塔 H109: 1 同, 时代应与之相仿, 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4 组。D 点遗存较早, T②: 140 鬲袋足形态同于官地 F3: 2, 时代应大约与之相同, 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1 组。但部分第 2 层遗存 (如 T1②: 143、144) 当有别于朱开沟文化。

8. 二里半遗址^[34] 经过两次发掘, 第二次发掘的遗存同于朱开沟文化。根据遗址第 3 层叠压第 4 层的关系, 结合器物形制, 可将遗存分成早、晚两组: 第 1 组以 IIF3 为代表, 包括第 4 层遗存; 第 2 组即是第 3 层遗存。IIF3: 1、2 鬲分别与官地 F4: 1 和朱开沟 M1027: 1 形似, IIT3④: 3 瓮足似于朱开沟 QH91: 1, 故此组应大体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1 组; 第 2 组 IIT③: 5 盆同于寨子塔 QH4: 1, 时代应与之相近, 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3 组。在该遗址中, IIT5④: 1 和 IH24: 1 两件素面圆腹罐, 造型奇特。

9. 小庙遗址^[35]

1990 年发掘, 面积 350 平方米, 清理房址 3 座和灰坑 8 个。简报将遗存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属于朱开沟文化。遗存差异不大, 可为一组。由于器物多为残片, 考虑到 T8③: 3 盆形制与二里半 IIF3: 6 相似, 但颈、肩处的折棱不明显, 应比二里半 IIF3 稍晚, 再综合其他器物特征, 其时代约当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2 组。

10. 西岔遗址^[36] 1997、1998 年发掘, 总面积 1600 平方米。清理房址 19 座、墓葬 19 座、灰坑 134 个。简报把遗存分成三期, 其中第二期遗存属于朱开沟文化。由于发表器物皆为采集品或出于地层中, 且均为残片, 故无法准确分组断代。从部分器物口沿看, 遗存大多应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的第 2、3 组。

11. 杨厂沟遗址^[37] 1988 年发掘, 共发现房址 3 座、灰坑 2 个。F3 鬲和甗都施规整细密绳纹, 皆高裆、袋足深而肥大且无实足根, 年代应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1 组相当。H1: 1 三足瓮形制似于高家坪 F4: 4, 但腹、足间没有明显夹角, 应较晚, F2: 2 鬲足部外撇特征似于朱开沟 QH82: 3 和庄窝坪 H16: 2, 其袋足容积所占比例与朱开沟 QH82: 3 相近而略大于庄窝坪 H16: 2, 从鬲的演变趋势上, 它应早于庄窝坪 H16: 2 而近于朱开沟 QH82: 3, 故 H1 和 F2 大约应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3 组。

此外, 在岱海周围的板城遗址^[38]还发现了一座房址 (F17), 出土两件肥袋足鬲和一敞口盆形甗。从袋足形状看, 时代较早, 应相当于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1 组。老牛湾遗址 T3②: 100、101 两件鬲^[39]均袋足肥大, 也应归为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的第 1 组。在清水河

县后城嘴遗址^[40]，清理了几个属于朱开沟文化的灰坑（简报“第四阶段文化遗存”），但出土器物多是残片，难以定其时代，从瓮口内折明显看，可能较早。

通过以上典型遗址中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年代组划分，可将这类遗存总体上划分为前后相继的四组。第一组，以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1 组为代表，包括官地组、南壕 1 组、白泥窑子 D 点、二里半 1 组、杨厂沟遗址以 F3 为代表的遗存和板城遗址 F17；第二组，以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2 组为代表，包括寨子塔 1 组、南壕 2 组、高家坪 1 组、小庙组和西岔组遗存；第三组，以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3 组为代表，包括寨子塔 2 组、庄窝坪组、高家坪 2 组、二里半 2 组、杨厂沟遗址以 F2 和 H1 为代表的遗存和西岔组遗存；第四组，以朱开沟遗址乙组遗存第 4 组为代表，包括寨子塔 3 组、南壕 3 组、高家坪 3 组和白泥窑子 A 点组遗存。参见以下表五：

四组	朱 4 组	寨 3 组		南 3 组	高 3 组	白 A 点			
三组	朱 3 组	寨 2 组	庄窝坪		高 2 组		二 2 组	杨 F2、H1	西岔
二组	朱 2 组	寨 1 组	小庙	南 2 组	高 1 组				
一组	朱 1 组		官地	南 1 组		白 D 点	二 1 组	杨 F3	板 F17

注：朱，朱开沟遗址；寨，寨子塔遗址；南，南壕遗址；高，高家坪遗址；

白，白泥窑子遗址；二，二里半遗址；杨，杨厂沟遗址；板，板城遗址。

（二）典型器物的类型与演变

我们在上述四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选取数量较多的器类，分析其内在的演变规律。

肥袋足鬲 是朱开沟文化中发现最多、形制最为多样的器类。这种鬲一般薄胎，大都饰有细绳纹和蛇状附加堆纹，多数口沿外有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小鋈钮，也有饰小耳的。根据其腹部形态可分为两型：

A 型 弧腹，腹最大径居中。根据口部形态差异，又可分成三个亚型：

Aa 型 侈口卷沿。可分四式，参见图七：1—4。演变趋势：器体由瘦高渐矮胖。袋足逐渐外撇，容积越来越小。器裆逐渐变低。

Ab 型 侈口折沿，沿面多内凹。可分四式，参见图七：5—8。演变趋势：同于 Aa 型。

Ac 型 敛口内折沿。不分式，参见图八：1。

B 型 鼓腹，腹最大径偏上。可分四式，参见图七：9—12。演变趋势：同于 A 型。

敞口甗 是朱开沟文化的重要炊器之一，发现较多，但完整器很少。较常见者，甗盆为卷沿，深弧腹。带腰隔，鬲部形态同 A 型鬲。可分四式，参见图七：13—16。演变趋势：甗盆腹部由圆鼓到瘦而较直，上腹由内敛而渐外敞，口沿逐渐上抬。鬲部演变与鬲同步。

盆 数量较多，种类丰富。一般腹饰绳纹，口颈部多磨光。是朱开沟文化的主要器类之一。根据口腹形态，可分三型：

A 型 大口，腹弧收。依口沿形制，可分两亚型：

Aa 型 卷沿。可分三式，参见图七：17—19。演变趋势：口外敞程度渐大，沿逐渐上抬。

Ab 型 折沿。可分三式，参见图七：20—22。演变趋势：口沿变化同 Aa 型。

B 型 卷沿，深弧腹。可分四式，参见图七：23—26。演变趋势：口沿由外侈而渐上抬，直至直口。

C 型 折沿或卷沿，斜弧腹较浅。未分式，参见图十一：1。

带钮罐 是朱开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在朱开沟遗址中发现较多，其它遗址也有少量发现。根据腹部特征，可分成两型：

A 型 鼓肩。可分四式，参见图七：27—30。演变趋势：整体由瘦高到矮胖，肩部愈圆鼓

B 型 鼓腹。可分四式，参见图七：31—34。演变趋势：整体由瘦高到矮胖，腹部愈圆鼓。

三足瓮 皆敛口，深腹，下附三足。依其器体形态，可分为两型：

A 型 瘦高体。可分四式，参见图七：35—38。演变趋势：腹足之间的夹角越来越大，以至几乎消失。袋足容积渐小，最后仅余浅痕甚至消失。

B 型 矮胖体。可分三式，参见图七：39—41。演变趋势：基本同于 A 型。

方杯 圆角方形口，深直腹，一般带有四个方形实足。仅在部分遗址中有少量发现，墓葬中尚未发现。可分三式，参见图七：42—44。演变趋势：四足简化，以至消失。

矮颈罐 小直口或卷沿，矮颈，宽肩。大多口部磨光，肩部以下通饰绳纹或者肩饰云雷纹条带。数量不多，但在各遗址中均有一定发现。可分三式，参见图七：45—47。演变趋势：肩愈宽鼓，整体由瘦高到矮胖。

通过对上述器物的分类和排序，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器物不仅自身有着一定的演变规律，而且有些器类的演变存在一定的共性：

1. 以上所能排序的类别中，除了甗、方杯和盆之外其它器类都存在由瘦高逐渐到矮胖的演变趋势；
2. 所有的袋足器都遵循着袋足容积渐小、裆部渐低（除去实足根）的规律；
3. A、B 型盆和敞口甗的甗盆的口沿皆由侈口而逐渐上抬。

根据典型单位的器物组合关系，把各器类的类型与式别纳入表六，并把部分与之共存但未分型式的器物也列入其中。 表六：

类型 期段		肥袋足鬲				花 边 鬲	高 领 鬲	甗	盆				带钮罐	
		A			B				A		B	C	A	B
		a	b	c					a	b				
晚期	4	IV	IV	√	IV	√		IV	III		IV	√	IV	IV
中期	3	III	III		III	√		III	III	III	III		III	III
	2	II	II		II	√		II	II	II	II	√	II	II
早期	1	I	I	√	I	√	√	I	I	I	I	√	I	I

注：√表示有该类型器物，但未分式或不辨式别。下同。

三足瓮		三足罐	方杯	矮领罐	双系罐	器盖	豆		碗形簋	盆形鉢	折沿碗	铜器				
A	B						细柄	粗柄				戈	刀	剑	鼎	护牌
IV	III	√	III	III	√			√	√			√	√	√	√	√
III	II	√	II	II				√	√			√				√
II	I	√			√	√										
I			I	I		√	√			√	√					

（三）分期与年代

1. 分期

从表六中典型陶器的型式组合看，四组地层和遗迹单位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和连续性。准此，这四组地层和遗迹单位可代表朱开沟文化从早到晚顺序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1段，以第1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物有 AaI 式、AbI 式和 BI 式肥袋足鬲、I 式甗、AaI 式、AbI 和 BI 式盆、AI 式和 BI 式带钮罐、AI 式三足瓮、I 式方杯和 I 式矮领罐。与之共存的还有 Ac 型肥袋足鬲、C 型盆、花边鬲、高领鬲、器盖、细柄豆、小盆形鉢和折沿平底碗等。第2段，以第2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物有 AaII 式、AbII 式和 BII 式肥袋足鬲、II 式甗、AaII 式、AbII 式和 BII 式盆、AII 式和 BII 式带钮罐、AII 式和 BI 式三足瓮，共存有花边鬲、C 型盆、双系罐、三足罐和器盖等器物。

第3段，以第3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类有 AaIII 式、AbIII 式和 BIII 式肥袋足鬲、III 式甗、AaIII 式、AbIII 式和 BIII 式盆、AIII 式和 BIII 式带钮罐、AIII 式和 BII 式三足瓮、II 式方杯、II 式和 III 式矮领罐等，与之共存的有花边鬲、三足罐、粗柄小盘形豆和碗形簋等。开始出现戈和护牌等形体较大的青铜器。

第4段，以第4组地层和遗迹单位为代表。典型器物包括 AaIV 式、AbIV 式和 BIV 式肥袋足鬲、IV 式甗、AaIII 式和 BIV 式盆、AIV 式和 BIV 式带钮罐、AIV 式和 BIII 式三足瓮、III 式方杯和 IV 式矮领罐等，共存有 Ac 型肥袋足鬲、C 型盆、花边鬲、三足罐、粗柄小盘形豆和碗形簋等器类，青铜器有戈、刀、短剑、鼎和护牌等。

为了更明显地反映朱开沟文化连续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根据各段文化面貌的同异，可将以上四段归纳成三期。第1段遗存，可为早期。此期是朱开沟文化的发生期，所有的袋足器袋足深肥、且无实足尖，盆类的口沿下折（卷）较甚。部分器物器口有方格纹和戳印纹。第2、3段遗存，可为中期。此期袋足器裆部降低，袋足容积变小，有些稍出实足尖，盆类器口沿均上扬，带钮罐腹部呈球形，方杯实足矮化，新出现 B 型三足瓮、双系罐、粗柄小盘形豆、碗形簋、戈和护牌等青铜器，与早期有明显不同。第4段遗存可为晚期。与中期相比，所有的鬲和罐都成扁方体，袋足器裆更低，容积更小，带钮罐腹部成为扁圆形，方杯平底，实足消失，盆类减少，青铜器种类增加。

2. 年代

朱开沟文化流行的 A、B 型盆和敞口甗在内蒙古中南部等地区是前所未有的，据许伟先生研究，在相当于夏代晚期的晋中地区第十四段遗存（以太谷白燕四期一段陶器为代表）中，

始见这种盆和甗^[41]。朱开沟文化的起始年代大约也在这一时期。属于早期 1 段的朱开沟 QH110: 1 直腹鬲和朱开沟 H1066: 1 侈沿弧腹鬲（参见图十二：1、5）分别与白燕四期一段的 T127③D: 1 和 H948: 1（参见图十二：8、12）相似，时代应相当。另外，此段的二里半 IIF3: 6 敞口盆，束颈折肩宽平底的特征与白燕四期二段的 H1119: 1 相近，H1119 年代相当于早商文化第一期^[42]，但二里半遗址的这件盆口沿未经轮修，沿下角相对较小，口部外张程度也相对较小，从盆类器的演变趋势看，它应稍早于白燕的那件。故朱开沟文化早期 1 段年代当与白燕四期一段相近或稍晚，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中期 3 段开始出现的青铜戈、方唇肥袋足鬲、盆和簋等，均具有浓厚的早商文化气息，说明朱开沟文化至少在该段已进入了早商阶段。晚期 4 段，朱开沟 T127②: 1 和 H5030: 1 鬲、M1052: 3 豆和 H2024: 9 盆分别与《早商文化研究》所分的“第二期第四段”的 AaIV 式和 AbIV 式鬲、AaIV 式豆和 EaIII 式盆相同，所以朱开沟文化晚期 4 段也大约相当于此时，即二里岗上层晚段。在此基础上可推测，中期 2 段应在二里岗下层时期，中期 3 段应大致相当于二里岗上层早段。

（四）文化因素分析及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1. 文化因素分析

朱开沟文化的主要器类，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大约可分为以下六组：

A 群 主要有 A、B 型肥袋足鬲、带钮罐和梯形弧刃石刀等（参见图八：1—5）。数量较多，特征鲜明，是朱开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但它们的来源却一直不是十分清楚。A、B 型肥袋足鬲和带钮罐，特征比较一致。尤其从朱开沟遗址来看，它们口部均饰方形鋁钮，高领较直或内凹，通体饰细绳纹。肥袋足鬲一般饰有蛇纹，带钮罐有的也饰蛇纹。因此，它们在渊源上当有共同之处。田广金等先生收集了我国北方地区的“带钮圆腹罐”资料（参见图九：1—7），认为这种器物“在内蒙古中南部至迟在龙山早期就已出现，后来成为朱开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并被周围夏商阶段诸文化吸收”^[43]。但田先生所举的大部分带钮罐，在体形上要么过于瘦高，要么过于肥胖（近球体）；从口部看，矮直口或矮领束颈，至颈部磨光，饰泥条附加堆纹，带两个对称的“鹰嘴状”鋁钮，与朱开沟文化的同类器明显有别。这些特征同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比较相近，可能属于另一带钮罐传统。老虎山遗址所出的那件罐（F29: 1）鋁钮形状和施钮方式与朱开沟文化的同类器相似，二者或许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二者质地、形制相差很大，且年代跨度较大，中间缺少演变环节。肥袋足鬲砂质薄胎、多红褐或灰褐陶色，有的带方形鋁钮的特征在先前和周邻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中目前还难以找到源头，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鬲肥袋足、无实足根的特点却应植根于当地的文化传统。本地的袋足鬲自产生以来就一直秉承这些特征，包括前文所讲的朱开沟甲类遗存的鋁手鬲，即使到最晚的式别，也仍然袋足肥大、无另附实足根，只是有的鬲在空足的下端捏出一点足尖或在空足中填塞泥球，包括甗的鬲部也是如此，可见这种传统影响之深。

对于有些肥袋足鬲和敞口甗的蛇纹装饰，也一直令学者们困惑，因为“蛇纹器在任何一个遗址所占的比重都很有限，即便象朱开沟这样规模较大的遗址，蛇纹器所占的比例也不大，在更多的遗址中仅仅是零星个别地出现”^[44]。田广金等先生认为，类似蛇纹的装饰在“老虎山龙山早期遗存”罐类器、朱开沟 VII 区“仰韶晚期夹砂小罐”和“西园遗址阿善二期陶罐”上均有发现，并据此推测蛇纹鬲大约出现在龙山晚期前后，“经过夏至早商时期，在内蒙古中南部地区达到鼎盛阶段。”^[45]我们认为，他们所指的“细泥条弯曲状附加堆纹”与朱开沟文化的蛇状附加堆纹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二者制作手法不同。前者都是贴附泥条，然后指压。饰于朱开沟文化肥袋足鬲口、颈部的细花边堆纹当属此类；后者则多是直接在器体上挤压、贴塑或者刻槽然后嵌细泥条，横截面呈三角形，宽不到 0.5 厘米。其二，用途有别。前者源于加固器体，后者则纯粹属于装饰。但是其具体来源，目前还说不清楚，有待考古工作

的进一步开展。

B群 主要有花边鬲和三足瓮等,是承自朱开沟甲类遗存的因素。花边鬲、三足瓮在朱开沟甲类遗存中发现较多,属于其陶器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开沟文化中,花边鬲和三足瓮数量仍然较多。此外,敛口斜腹甗和盂在朱开沟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并随着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逐渐减少,应是朱开沟甲类遗存在本地的遗留。

C群 属于来自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包括多数形态的盆、敞口盆形甗、深腹罐、小盆形钵、钻孔石镰和陶鸟形塑等器物(参见图十:1—8,17—22)。朱开沟文化的盆多数在下七垣文化中都能找到相似者,并且在下七垣文化本身非常流行,而在前文所论述的当地先于朱开沟文化的朱开沟甲类遗存中均不见。敞口盆形甗的盆部形制特征同于Aa型盆,与当地所固有的敛口甗截然不同,而与下七垣文化的同类器雷同。但是甗鬲的形态显然与A群的肥袋足鬲相同,仍就是本地传统风格,明显不同于下七垣文化的同类器。此类甗在晋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中也有相似的器形,这说明敞口甗是下七垣文化经由晋中地区北上的因素。石镰在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都有发现,但带有钻孔的只发现于下七垣文化,故它应来自下七垣文化。陶鸟形塑在下七垣文化中也发现有相类者,考虑到本地故所未有,此类器也当源于下七垣文化。

D群 主要包括方杯、双系罐、折腹盆、C型盆、器盖和折沿碗等(参见图十一:1—9),数量较少。从形制上看,与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应是二里头文化的因素。方杯和双系罐都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虽然在晋中也有发现,但数量较少,不具代表性。因此,它们当溯源于二里头文化。朱开沟文化发现的器盖皆残,只余器钮,主要有三种形制:蘑菇形实心钮、平顶空心钮和弧顶空心钮。类似的器盖在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均有较多发现,但下七垣文化的器盖多为弧顶空心钮,不见平顶空心钮。所以,器盖也应到二里头文化寻找渊源。折腹盆、C型盆和折沿碗是二里头文化的习见器物,也当同属二里头文化的因素。

E群 包括各种高领鬲、侈沿深腹鬲、敛口圆腹钵和浅腹细柄豆等(参见图十二:1—6),数量不多,属于源自晋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器物。高领鬲是晋中地区夏时期最具特色的器物^[46],朱开沟文化的高领鬲皆应来源于此。侈沿深腹鬲和敛口圆腹钵在晋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中都能找到相似的同类器,也是来源于此。浅腹细柄豆在晋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和下七垣文化中都有较多发现,但是晋中地区自龙山时代就已有类似器^[47],而且晋中在地域上与朱开沟文化毗邻。故此地当是这类豆的起源地。

F群 包括方唇鬲、折沿鼓腹盆、平折沿深直腹盆、粗柄小盘形豆、碗形簋、青铜戈和鼎,还有云雷纹装饰等(参见图十三:1—10),在朱开沟文化的晚期有较多发现。从这些器物的形制和纹饰风格来看,应是来自早商文化的因素。方唇鬲乳状大袋足、无发达实足根的风格,与A、B型鬲相同,但其口沿修整加工为宽方唇的特点却又明显受商式鬲制法的影响。矮领罐肩部和平折沿深直腹盆腹部所饰的云雷纹说明了部分早商文化因素已经融入了朱开沟文化。在有些墓葬中,早商式的铜戈与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器物带钮罐、梯形弧刃石刀以及自身特点的铜刀、铜短剑和铜护牌等遗物共出。在朱开沟M1052中,只出商式的簋、豆和青铜戈,不见具有朱开沟文化自身风格的器物。这说明不仅早商文化的传统融入朱开沟文化,而且商人也可能渗透到了本地。

此外,与朱开沟文化的矮领罐形制相近的器物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和下七垣文化尤其是辉卫型中都比较常见,无法确指其源头。但是朱开沟文化的矮领罐是由此二者发展而来当是没有疑问的。朱开沟遗址采集到的实心体喇叭口形耳环可能是来自叶尼塞河流域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因素。据研究,这种耳环可能是从哈萨克斯坦经新疆传入北方长城地带的^[48]。朱开沟文化颇具特色的青铜器包括环首刀、短剑和铜圆牌等,都属于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它们都最早出现在朱开沟文化。但是否就是源于本地,尚不清楚。

综上,朱开沟文化的器物群尤其是陶器群的主体由 A、B 和 C 群器物构成。其中 A 群和 B 群器物是朱开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共同构成了朱开沟文化的核心。A 群器物部分吸收了当地的文化传统,并继承了朱开沟甲类遗存的某些因素。B 群器物虽种类不多,但数量较多,在朱开沟文化的器物群中占居十分突出的地位。C 群器物是来自太行山东麓下七垣文化的因素,数量较多,在朱开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朱开沟文化是由以上各组文化因素碰撞、融合而形成的。

2. 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1) 与晋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的关系

朱开沟文化所分布的地域不仅与晋中地区相邻,而且两地之间一直存在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朱开沟文化除了来自这一地区的 E 群器物以外,来自下七垣文化的折沿圆肩盆、敞口钵和来自二里头文化的双系罐、方杯等器类(参见图十四:1—5)在晋中地区也同样有发现,这说明晋中地区还是下七垣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朱开沟文化交流的必经通道。另外,在晋中地区白燕遗址第五期遗存中出现了较多的早商文化因素,考虑到朱开沟文化第二段以后也涌现了早商文化的因素,可以说晋中地区还应是早商文化因素北进的中间站。

(2) 与早商文化的关系

从上文对来自早商文化的 F 群器物的分析看,朱开沟文化同早商文化关系非常密切。两种文化因素相结合而产生的方唇肥袋足鬲、肩饰云雷纹条带的矮领罐以及早商式器物与本地器物在墓葬中共存等现象,均表明早商文化因素已经深深地融入了朱开沟文化,二者的文化因素已经紧密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外,在早商文化中也有朱开沟文化的因素。例如早商文化二里岗类型所见的个别乳状肥袋足、无发达实足根的陶鬲无疑是受到了朱开沟文化的影响。另外,关中地区以陕西耀县北村遗址为代表的早商文化北村类型中,也发现有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器物。如陕西扶风壹家堡早期遗存发现有蛇纹鬲^[49],耀县北村^[50]、礼泉朱马嘴^[51]商文化遗存中见有蛇纹鬲和梯形弧刃石刀等。

(3) 与大坨头文化的关系

朱开沟文化与大坨头文化在盆和甗类器上存在一定的共性,但二者的典型陶鬲差别很大,前者陶鬲多深弧腹,肥袋足,一般无实足根;后者则多为鼓腹或斜腹,袋足浅而瘦,有些有较明显的实足根。它们之间互相交流的因素有鬲、簋和甗盆等器类。朱开沟文化的浅袋足鼓腹鬲、大敞口喇叭形圈足簋和卷沿弧腹的甗盆等器物(参见图十五:1、5—7),数量不多。从形制上看,皆与大坨头文化同类器相近,应是从大坨头文化传播来的。而大坨头文化所见的侈沿深弧腹鬲袋足肥大,则可能是受朱开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但其袋足下部仍较朱开沟文化的同类器瘦,保留有自身的特色(参见图十五:2、9)。大坨头文化所见的口沿内折、无实足根的肥袋足鬲也可能来自朱开沟文化的同类器(参见图十五:3、10)。以上现象说明了朱开沟文化与大坨头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二者之间的交流应是相当的频繁。此外,寨子塔 H109:1 和张家园 87T18②:1 鬲(参见图十五:4、11),弧腹,乳状肥袋足,显然是朱开沟文化鬲的典型特征,而它们皆附有较明显的实足根,这可能是受到了大坨头文化实足根鬲的影响所致。

(4) 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关系

朱开沟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前者对后者由西向东的单向流动(参见图十六:1—6,7—10)。以往就有很多学者注意到,夏家店下层文化中所见的饰蛇状附加堆纹的鬲和甗,是由内蒙古中南部向东传播的结果^[52]。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的蛇纹鬲从器物整体形态和口部特征看,都是朱开沟文化鬲的特色。但需要注意的是,它和甗上所饰的

蛇状附加堆纹呈“U”形、曲尺形或叶脉形等，图案均比较复杂，纹饰相对较密。而朱开沟文化较多见的则是单一的折线或直线形，非常简单稀疏。这仅仅是因为目前考古发现尚少的缘故吗？另外，“夏家店下层文化尤其是西区较常见的罐或鬲等口沿带鋡钮的作风也属于来自朱开沟文化的因素”^[53]。不仅如此，夏家店下层文化还是朱开沟文化的蛇纹鬲等因素继续向东和向北传播的媒介。现在一般认为，外贝加尔地区所见的蛇纹鬲（参见图十六：11—14）就是通过夏家店下层文化远播到蒙古东部与外贝加尔地区的^[54]。

（五）流向

朱开沟文化结束之后，其文化因素呈辐射状向四周传播，但主要有三个流向：

1、部分因素为本地后起的西岔文化所吸收。从目前发表资料看，主要有卷沿鼓腹盆、梯形弧刃石刀、动物形陶塑和铜耳环等（参见图十七：4—7，10—13）。但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因素，如饰蛇纹的肥袋足鬲、带钮罐以及花边鬲等，在西岔文化中都尚未发现。而西岔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如带双鋡的高领筒形鬲和高领鼓肩罐（壶）等与朱开沟文化的鬲、罐类器截然不同，尤其是鬲都带有较高的实足根，更是有悖于本地一直以来的传统。所以，西岔文化虽然部分接受了朱开沟文化的因素，但其主体因素显然与朱开沟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

2、部分因素南流，为李家崖文化所继承。吕智荣先生提出朱开沟文化三期遗存（即《朱开沟》报告中的第三期五段）与李家崖文化是同一文化前后发展的不同阶段，后者由前者发展而来^[55]。田广金等先生则认为朱开沟文化晚期开始向东南方移动，发展成为陕西北部的李家崖文化^[56]。李家崖文化的肥袋足鬲、卷沿鼓腹盆和梯形弧刃石刀确实是源于朱开沟文化的因素（参见图十七：1、3、5，14—16）。但吕文所比较的簋和豆等器类显然应是早商文化的因素，而非朱开沟文化的典型器。从目前发表资料看，若说李家崖文化从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还缺乏充分的证据。而田广金等先生所坚持的“朱开沟文化”（包括朱开沟遗址甲类遗存和本文所重新界定的朱开沟文化）由农转牧，所依赖的证据是墓葬中葬羊比例的增加。但是据我们统计，按照报告的分期，第三段 162 座土坑墓中有 11 座随葬有羊下颌骨，而第四段和第五段共 114 座土坑墓中只有 M1098 和 M1064 随葬有羊下颌骨。而其中通过随葬器物确知属于本文所谓朱开沟文化的只有 M1064。另外，在朱开沟文化结束后存在于当地的西岔文化，时代与李家崖文化大致相当。从其所出的陶器、生产工具和房址等来看，该文化仍是定居而有农业的文化。因此，“朱开沟文化”受气候转向干冷的影响，由农转牧，向南移动发展成李家崖文化的设想可能过于简单化了^[57]。

3、向东流动，主要流入以下几种考古学文化：

（1）围坊三期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目前，学界对此二类遗存是前后相衔的两种文化还是属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但一般认为围坊三期遗存和张家园上层遗存是前后相继的^[58]。花边鬲是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遗存的标志性器物之一，但它最早出现于朱开沟甲类遗存，并为朱开沟文化所接受。韩嘉谷先生曾经指出，这类风格的器物至少在晚商时期已伴随着北方系青铜器而广布于中国北方的长城地带^[59]。围坊三期和张家园上层遗存在年代上晚于朱开沟文化，此两种遗存中的花边鬲应当就是承自朱开沟文化因素。另外，围坊三期的 T5①：1 和 T8②：6 鬲分别与白泥窑子采集鬲和官地 F3：2 鬲相近，也应源于朱开沟文化（参见图十七：1、2，8、9）。张锬把围坊三期归入张家园上层文化，认为来自于朱开沟文化的因素是张家园上层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群，构成了张家园上层文化的主体，由此表明张家园上层文化主要是由朱开沟文化发展而来的^[60]。这种分析是否有道理，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2）魏营子文化。花边鬲是魏营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类。但魏营子文化的花边鬲来源并不单一。据研究，魏营子文化的花边鬲是“朱开沟文化”（包括朱开沟甲类遗存）附

加堆纹因素融合了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药王庙类型和东部高台山文化的某些因素而形成的^[61]。此说是有道理的。

此外,在东北西部西拉木伦河流域和嫩江流域等地的晚商时期遗存中发现的带领鼓腹鬲,折沿内凹,袋足肥大,从形制上看应当是从朱开沟文化传播而至的(参见图十六:15—21)。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陶鬲的领口多饰有珍珠纹,据王立新先生研究,这种纹饰是受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古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并在与带领鼓腹鬲结合后,随着这种鬲向东进行传播^[62]。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致可得出以下结论:

1、在朱开沟甲类遗存阶段,地处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甲类遗存受来自河湟、关中和晋南—豫西等地的考古学文化影响较大。在文化面貌上与晋中、忻定和冀北等地有较多的一致性,关系比较密切。朱开沟甲类遗存偏晚阶段,来自河湟和关中地区的因素逐渐减少以至消失。而在朱开沟文化时期,较多的因素来自于太行山东麓的下七垣文化和南邻的晋中地区夏至早商时期遗存,并与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关系密切。无论是在朱开沟甲类遗存时期还是在朱开沟文化时期,晋中地区不仅自身与内蒙古中南部和河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往频繁,还是内蒙古中南部和河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与其南部和东部的考古学文化交流的中间站,起着十分重要的媒介作用。

2、值得注意的是,朱开沟甲类遗存和朱开沟文化在文化面貌上的一个较大区别是前者有较多的瓮形鬲和口沿内折的敛口甗(上部可说是敛口瓮形),后者较多敞口盆和敞口盆形甗。这两种考古学文化在内蒙古中南部的更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敞口甗文化系统对敛口甗文化系统的革命。在朱开沟文化取代朱开沟甲类遗存之后,敛口甗便趋于消失。

3、一般认为,下七垣文化属于先商文化。那么,以敞口甗和敞口盆为代表的大量下七垣文化因素出现在内蒙古中南部,导致了当地的朱开沟甲类遗存的消亡,形成朱开沟文化。并且在朱开沟文化的晚期又融合进来较多的早商文化的因素,还可能出现了商人的墓葬

(M1052)。这反映了朱开沟文化同商文化系统乃至商人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商人在朱开沟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本文是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内容。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导师王立新先生的悉心指导和众多师兄、同学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王乐文.朱开沟遗址出土遗存分析[J].北方文物,2004,(3):17~28。本文所提到的“上篇文章”皆指此文,不再另注。

^[2] A、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开沟遗址[J].考古学报,1988,(3):301~332;

B、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文中所引的朱开沟遗址材料皆出于此,不另注。

^[3] 参见注[2]B第15页“图一三 T227、T247北壁剖面图”。

^[4] 吉发习、马耀昕.内蒙古准格尔旗大口遗址的调查与试掘[J].考古,1979,(4):308~319。

^[5] 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J].史前研究,1983,(2):92~100。戴应新.陕西神木

县石炭龙山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77, (3): 154~157.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伊金霍洛旗文物管理所、鄂尔多斯博物馆. 伊金霍洛旗白教包墓地发掘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327~337.

^[7]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神木新华遗址 1999 年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2, (1): 3~11.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陕西神木县寨峁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2, (3): 3~18.

^[9] 高天麟、张岱海、高炜. 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J]. 史前研究, 1984, (3): 22~31.

^[10] 参见注[9]第 28 页的“表二”。

^[11] 张忠培. 齐家文化研究[A]. 中国北方考古文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29.

^[12] 秦小丽. 试论客省庄文化的分期[J]. 考古, 1995, (3): 241~255.

^[13] 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有¹⁴C 测年数据: BC3616-3356 (T228④) 和 BC3037-2788 (T203⑤), 均经树轮校正。显然, 这两个数据偏早太多, 不可用。

^[14] 目前, 学界对该类遗存的内涵和命名有两种认识: 1、老虎山文化。老虎山遗址发掘报告[R]和孙周勇、韩建业等先生认为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以及晋中和晋西北部分地区的龙山时代早中期遗存, 都属于老虎山文化。不过, 老虎山报告[R]和孙文对岱海周围以外的遗存的认知有一定差异, 而且韩先生把本文“以朱开沟遗址甲组遗存为代表的遗存”的早期阶段也归入其中。参见韩建业. 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年; 孙周勇. 关于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J]. 考古与文物增刊, 2002, 9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老虎山遗址发掘报告—岱海考古(一)[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永兴店文化。魏坚、崔璇等先生认为只有岱海地区的遗存为老虎山文化, 上述其它地区的同时期遗存皆与之有别, 统一命名为永兴店文化。参见魏坚、崔璇.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133~135; B、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永兴店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 [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45; 魏坚. 试论永兴店文化[J]. 文物, 2000(9): 64~68. 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所以论及时径称其“永兴店文化”。

^[15] 魏坚. 试论永兴店文化[J]. 文物, 2000(9): 67.

^[16] 田广金. 论内蒙古中南部史前考古[J]. 考古学报, 1997(2): 121~145. 杨泽蒙. 朱开沟文化因素分析及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412~437.

^[17] 王立新. 单把鬲谱系研究[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127、137. 下引王立新先生的观点皆出于此, 不另注。

^[18] 国家文物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晋中考古[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29~135.

^[19] 张忠培, 杨晶. 客省庄文化单把鬲研究——兼谈客省庄文化的流向[J]. 北方文物, 2003, (3): 5~14.

^[20] 井中伟. 蛋形瓮研究.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D]. 2002, 23.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临汾地区文物局. 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80, (1): 27 图十: 1.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 晋南考古调查报告[J]. 考古学集刊(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19 图九: 22.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洪洞侯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发掘报告[A]. 三晋考古(2) [C].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6, 203 图九: 10 和 211 图十四: 4、11.

^[24] 韩建业, 杨新政.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J]. 考古学报, 1997, (1): 10 图四: 47.

- ^[25]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J]. 文物, 2001, (8): 15 图二一: 4、图二二; B、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曲村(1980—1989)[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331~763.
-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张家坡西周墓地[R].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125.
- ^[2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沅西发掘报告[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62, 24 图一二: 3.
- ^[2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寨子塔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311~32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寨子塔北坡遗址清理简报[A].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C]. 远方出版社, 2001, 57~59.
- ^[29]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官地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114~117.
- ^[30]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南壕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16~222.
- ^[31] 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 准格尔旗高家坪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61~271.
- ^[32] 乌兰察布博物馆、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 准格尔旗庄窝坪遗址发掘简报[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174~176.
- ^[33] 汪宇平. 内蒙古清水河县白泥窑子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J]. 文物, 1961, (9): 12. 崔璇. 白泥窑子考古纪要. 内蒙古文物考古. (4): 34~37.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室. 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 A 点发掘报告[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206~208.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考古研究室. 清水河县白泥窑子遗址 D 点发掘报告[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2)[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234~236.
- ^[3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准格尔旗二里半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J]. 考古学集刊. (1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108~113.
- ^[3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准格尔旗小庙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1)[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273~275.
- ^[3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 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A].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C]. 远方出版社, 2001, 60~78.
- ^[3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系. 凉城县杨厂沟遗址清理简报[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1, (1): 11~12.
- ^[38]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日本京都中国考古学研究会, 岱海地区考察队. 板城遗址勘察与发掘报告. 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223.
- ^[39] 见于王连葵. 河套和岱海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初探[A]. 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C]. 海洋出版社, 1991, 189~190 图二: 2、7.
- ^[40] 曹建恩. 清水河县碓臼沟遗址调查简报[A]. 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考古报告集[C]. 远方出版社, 2001, 81~87.
- ^[41] 许伟. 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J]. 文物, 1989, (4): 42~47.
- ^[42] 王立新. 早商文化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11—212. 下文凡是涉及早商文化的内容皆出于此, 不再另注.
- ^[43] 田广金, 郭素新.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渊源[J]. 考古学报, 1988 (3): 261~267.

- [44] 李水城. 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J]. 文物, 1992, (1): 56.
- [45] 田广金, 郭素新. 鄂尔多斯青铜器的渊源[J]. 考古学报, 1988 (3): 268-271.
- [46] 许伟. 晋中地区西周以前古遗存的编年与谱系[J]. 文物, 1989, (4): 42-48.
- [47] 国家文物局,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晋中考古[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147 图一
一六.
- [48] 林沄. 夏代的中国北方系青铜器[A]. 边疆考古研究(1)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5-7.
- [49]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 陕西扶风县壹家堡遗址 1986 年发掘报告[A].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考古学研究
(二)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360 图一二: 17.
- [5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商周室、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实习组. 陕西耀县北村遗址 1984 年发掘报告[A]. 北京
大学考古学系. 考古学研究(二) [C].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323 图三三和 337.
- [51] 北京大学考古系. 陕西礼泉朱马嘴商代遗址试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 2000, (5): 6 图五: 6.
- [52] 刘观民. 试析夏家店下层文化陶器[A]. 中国考古学研究[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98; 田广金, 郭素新.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J]. 考古学报, 1988, (3);
C、刘观民. 苏联外贝加尔地区所出几件陶鬲的分析[A]. 中国原始文化论集[C]. 北京: 文物出版
社, 1989, 371-377;
D、李水城. 中国北方地带的蛇纹器研究[J]. 文物, 1992, (1): 55.
- [53] 王立新, 卜箕大. 对夏家店下层文化源流及与其它文化关系的再认识[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
系十周年纪念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8, 185.
- [54] 同注[52].
- [55] 吕智荣. 朱开沟古文化遗存与李家崖文化[J]. 考古与文物, 1991, (6): 47-51.
- [56] 田广金, 史培军.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J]. 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7, (2): 48.
- [57] 林沄. 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J]. 燕京学报. 新十四期, 2003, 111.
- [58] 赵福生, 刘绪. 西周燕文化与张家园上层文化类型[J]. 北京文博, 1998, (1): 34. 纪烈敏. 燕山南麓青铜文
化的类型谱系及其演变[A]. 边疆考古研究(1)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112-114.
- [59] 韩嘉谷. 花边鬲寻踪——谈我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的形成[A]. 北方考古研究(四) [C].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
社, 1999, 141-149.
- [60] 张锬. 京津唐地区的夏商时期遗存. 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D]. 2001, 35-36.
- [61] 董新林. 魏营子文化初步研究[J]. 考古学报, 2000, (1): 18.
- [62] 王立新. 中国东北地区所见的珍珠纹陶器[A]. 边疆考古研究(2)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120.

Discussion on the Two Kinds of Remains in ZhuKaigou Site

Wang Lewen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what have been studied and combining with the new material, analyses the remains in ZhuKaigou Site again, which actually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f archaeology cultures with different nature. Referring to the similar remains of other sites in adjacent areas, separately discusses problems such as their distribution, stages, origin, relations with other archaeology cultures

and so on.

Key words:Remains-Jia of ZhuKaigou;ZhuKaigou Culcure

收稿日期: 2004-9-6

作者简介: 王乐文(1977-),男(汉),河南郸城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在读博士,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助教。